

第一辑



李辉主编
丁刚著

二战， 在寻访中

[illegible]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李 辉 主编

丁 刚 著

人踪书影文丛|第二辑

二战，在寻访中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在寻访中/丁刚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人踪书影文丛.第二辑/李辉主编)

ISBN 7—216—04137—2

I. 二…

II. 丁…

III. 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9609 号

人踪书影文丛·第二辑

二战,在寻访中

丁 刚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8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8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7—216—04137—2/I·36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北京

二战 自序 在寻访中

编

完这本集子，正是诺曼底登陆 60 周年纪念日。今年的庆祝活动规模盛大，远远超过以往。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总理首次应邀参加，也因为法国人为准备这场活动格外起劲。当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那片海域时，盛大的海、陆、空三军阅兵式也将拉开序幕。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啊！

算起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至少也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可这些年来，我在欧洲和美国工作、生活却总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幻觉，就好像二战硝烟才刚刚散去。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洲人、美国人始终就没走出那场大战的影子，他们仍然在为 60 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争辩着、思考着。即便对不少人来说，那原本是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做过的事情。

199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时，我在瑞典做常驻记者。瑞典在二战中是个中立国，按说没有太多特别值得追述的历史。可瑞典人却用那个机会揭开了他们多年都不忍心去碰一碰的疮疤。在瑞典人的讨论中，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瑞典的中立是在夹缝中的选择，瑞典的中立绝不是出于对世界和平的考虑，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正义与邪恶之间选择中立，实际上等于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瑞典在二战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当全世界的人类在为和平作出牺牲的时候，瑞典选择了旁观者的位置”。

读了这样的话，我不能不敬佩瑞典人的勇气。没有人要去追查瑞典在

二战 自序

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因为中立毕竟不同于邪恶。但是，瑞典人没有放过这个反省的机会。它使我想到了，在欧洲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的时候，在亚洲，我们仍然要为一些早已清楚的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费力地争辩着。

于是，带着这样的一些思考和比较，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博物馆，寻访了一个又一个与二战有关的历史遗址。我从图书馆里借来最新的书籍，并设法采访了一些经历过二战的老人……我和许多欧洲人一样，关注着这场大反思的进展。后来，我转到美国工作，依然保持着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应该说，对二战的了解也给了我的记者工作不少帮助，它使我在把握许多国际问题的走向时，能多一些历史的分析。

这本书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在欧洲和美国工作时写的，这次整理时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也对文字作了些改动，增添了一些新的感受。第二部分的文稿都是新写的，当然也依据了原来的采访记录、录音或录像。因为职业的原因，有些文章可能还留有新闻报道的痕迹。同样也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对欧洲人的反思多用了一些笔墨，我想这多少也能反映出20世纪末欧洲人的那段思想经历。

记不清是哪个历史学家说过，历史就像个口袋，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去。现在，我在这本小书中也装了一些我的东西，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2004年6月6日于星园

二战

在寻访中

目录

MULU

自序

1 轻轻走进安妮的“密室”

21 “死亡火车”从密林中发出

38 比利时有个钱秀玲

63 为了自由比利时

——一位反法西斯老战士的回忆

73 在美国大兵的长眠之地

88 走进德国兵的墓地

102 纳粹导弹基地探秘

116 “D日”，讲不完的故事

132 华沙不相信眼泪

146 纽伦堡：迷惑与恐怖

160 历史之网中的奥地利

173 追寻“失去的博物馆”

183 揭开“纳粹黄金案”之谜

195 忏悔与遗忘：面对奥斯威辛的抉择

213 人间自有正义在

——记油画《南京大屠杀》在荷兰展出

222 夏威夷：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

轻轻走进 安妮的“密室”



这些安妮的照片分别摄于1935年到1941年

脚步轻轻，轻轻……是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安妮？还是怕难以承受心灵的震撼？推开虚掩的书架，钻过低矮的洞口，顺着窄窄的楼梯爬上阁楼……

在阿姆斯特丹那密如蛛网的运河旁，数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小楼，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地冻天寒，惟独这座小楼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 263 号，走进那个留给世界一本日记的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的故事之中。

安妮这个不到 16 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以那本厚厚的日记告诉世人：活着，并且永远要记住。



安妮的雕塑

从街面上看，“安妮之家”这幢小楼与紧邻的楼房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你走到后院，就可以看到这幢楼的背后还紧贴着一个三层的小楼，就像是一个挂在后背的背包一样。那便是安妮所称的“密室”。在这个“密室”中，安妮与父母、姐姐和另外4个犹太人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她用自己的日记记录了“密室”中的生活。

“密室”早在50多年前已被纳粹洗劫一空。尽管有人曾建议复原“密室”中的摆设，可安妮的父亲却不同意用虚假的模型来替代那些记忆苦难的原物。“密室”中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些划在墙上的印记和贴在墙上的画片。像所有那个年龄的小姑娘一样，安妮也把当时的歌星、影星的画片贴在了自己的床头。在父亲奥托的房间的门边上，还有几道深深的铅笔线。从记录的日期看，安妮在这段时间里长高了13厘米。

在另一间小屋门旁的墙上，还可以看到一幅安妮和父母一起制作的地图。当年，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密室”中的人们就一边悄悄地收听广播，一边在地图上标出盟军的进军路线。他们在惶恐不安中期待着走出“密室”的日子。



从空中拍摄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密室”的位置



在街头玩耍的安妮

纪念馆里虽然很少有安妮的遗物,但仍有不少照片。安妮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所以才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安妮的照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犹太女孩的故事。

安妮·弗兰克 1929 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就像所有普通德国女孩子一样,她也有过欢乐的童年:1932 年 7 月,欢快活泼的安妮和德国小朋友在草地上一起玩耍;1933 年 3 月 10 日,小安妮与家人一起去法兰克福市的商业中心,在回来的路上照了一张照片,小安妮腼腆地站在母亲的身边。几个月后,迫于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小安妮全家迁居到了阿姆斯特丹;1934 年秋,安妮上学了。照片上的安妮和班上 30 多个小朋友一样,表情略显紧张。

战争的炮火打碎了安妮一家人的平静生活。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侵入荷兰,荷兰政府和皇室流亡英国。5 月 14 日,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惨遭德军的狂轰滥炸,千余平民被炸死,荷兰军队不得不宣布



1934 年秋,
安妮上学了。这
是安妮与班上
同学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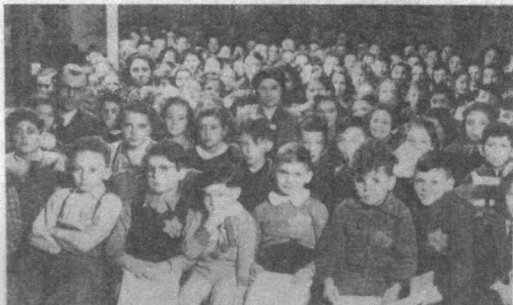
投降。德军的铁蹄踏进了阿姆斯特丹。那一年的冬天，德军要求所有荷兰居民重新登记，并解雇了所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犹太人。第二年，德国占领军给所有荷兰居民发放了身份证，犹太人的身份证全都被盖上了一个“J”字的印记。许多荷兰人不敢再和犹太人联系，甚至连非常熟悉的人在街头碰到，也会赶快低下头走开。像所有犹太人一样，安妮的父母亲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已经预感到，厄运在等待着他们一家。

1942年的夏天来临了，放假前，安妮拿到了成绩表，除了代数的4次考试全是6分以外，其他10多门功课成绩几乎全是8分或9分。在当天日记中，她这样写道：“在成绩这件事上，他们（指自己的父母）的看法与别的父母不一样，成绩好坏，他们从来不担心。”其实，当时安妮的父母亲哪还顾得上看她的成绩，他们在为全家的命运担忧着。

在展出的照片中，有一张虽不是奥托所照，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照片摄于1942年5月，那是数十位犹太孩子的合影，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依然流露出一天真的笑容，可胸前缝着的那个大大的六角星符号却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照片中并没有安妮，但安妮的命运和他们一样。1942年5月，占领荷兰的德军要求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这样的标志，一场大迫害就要开始了。

1942年7月6日，安妮一大早就被母亲叫醒。她看了一下表，不

这些天真的犹太儿童还不知道，当他们胸前缝上那个六角星符号时，灾难很快就要来临了（1942年5月）



过才 5 点半钟。全家人离开的时间来到了。安妮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是我们要去北极一样。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谁还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走在外面……我都快要被窒息了，可没有人问我感觉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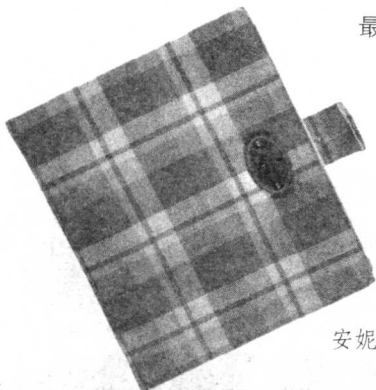
从此，安妮一家人开始了在普林森格拉赫特街 263 号楼上“密室”里的生活。

二

在楼下的展览厅里，我看到了那个敞开着的浅浅的粉红色格子布面的日记本。

194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那天早上 6 点钟，安妮就兴奋地睡不着了，因为这一天是她 13 岁的生日。7 点钟她就走进了父母亲的房间，尽管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了荷兰，全家人命运未卜，可安妮的父母亲还是要给孩子一个欢快的生日。那一天，安妮收到了很多礼物，有胸针、拼板玩具和蜡烛，而她最喜欢的就是这本粉红色格子布面的日记本。从此，安妮开始写日记，她把自己的日记称为最好的朋友“吉蒂”。

安妮的朋友列艾丝后来回忆说，安妮的许多同学都知道她一直在写日记。后来留下来的这本日记其实并不是安妮的第一本日记。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常会看见安妮趴在桌



安妮把这本日记留给了世界

安妮用独特的方式写着自己的日记，她常常会在日记里贴上一些照片，有时还会为照片写上一段简短的注释



上写日记，有时还用另一只手遮着，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大家都想知道，安妮在日记中是怎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的，可安妮从来也没有让别人看过她的日记。列艾丝说：“我那时觉得安妮的字写得很好看，就总模仿她拿铅笔的样子。”

一个月后，安妮和家人一起躲进了“密室”。在两年的时间里，安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她常常在日记本上贴上一些旧照、明信片 and 画片等，在一旁写下说明。在一张她觉得自己最漂亮的照片旁，她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真希望自己能永远像这张照片上那样年轻、美丽，我要去好莱坞拍电影。”安妮有时为了给日记作些补充，还贴上一些夹页。她的笔迹有时工整，有时有些潦草，但笔迹中流露出的却是一个女孩子特有的稚气。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危险与浪漫，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

1944年3月29日，安妮从广播上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战后把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信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她就产生了写一本与“密室”有关的小说的愿望。复活节的那天，突然有警察进到小楼里搜查，所幸

没有发现“密室”，可“密室”里的人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刻。父亲建议安妮烧掉日记，安妮则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日记没了，我也不要活了。”

在那个狭小的“密室”里，是“吉蒂”伴随着安妮度过了一个个紧张、单调的日子，也是日记给了安妮一个打开心灵之窗的机会。这一年的5月1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她想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将依据她的日记写成，书名就叫《密室》。几周后，安妮开始编辑她的日记，她把日记本上的日记誊写到一些白纸上，还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裁减和增补，改写了一些段落。与此同时，安妮仍然坚持在日记本上写着日记。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另一个藏在这里的犹太男孩）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要10点半了。通常，他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讲课。忽然，他们听到楼上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

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后来回忆说，她没有听见敲门声，突然看见有个瘦高个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那人用枪指着他们，压低嗓门说：“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随后，他又扭转身出去。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荷兰纳粹警察冲了进来，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密室”的位置。

一个荷兰纳粹警察对安排安妮一家躲藏的库格勒说：“我们全都知道了。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幢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库格勒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他站起来，向楼上走去。

纳粹警察跟着他上了楼，他们站立在那个遮掩着通往“密室”楼梯的书架前。库格勒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外表很镇静，可内心却非常害

怕……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最关键的地方。”他不得不指了指那个书架。

书架被推开了，纳粹警官卡尔领着几个穿便衣的警察爬上了“密室”。他们先是让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接着又把他们浑身上下搜了一遍。在确认没有武器后，卡尔才吼叫着让楼上的人全都把钱和首饰交出来。他一把抓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

奥托告诉正在搜查的卡尔，他们在这里已经躲藏了两年。“两年？”卡尔惊疑地叫了一声。当他看到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铺和窗户之间的灰色军用床脚柜时，更觉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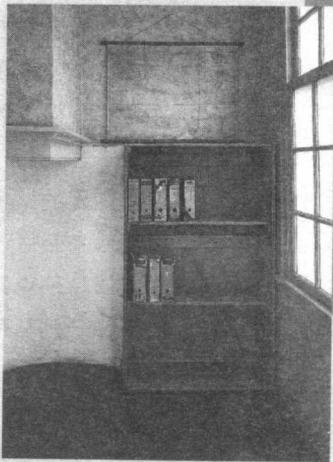
“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艺？”他问奥托。

“那是我的东西。”奥托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

听了奥托的回答，卡尔不觉脸红了起来。

随后，藏在楼上的8个犹太人全被送进了警察局。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呢？这个谜至今也没有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就在那天早上，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幢楼里躲藏着犹太人。

当晚，米普爬上了小楼，她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看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还有一些显然是散落在地的纸片。米普



就是这个书架挡住了通往“密室”的通道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一周后，德国人将“密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米普当时心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她将把日记本亲手交还给安妮。

在安妮一家被捕后，米普也曾千方百计地托人去疏通关系，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她甚至试图收买那些盖世太保，可最终还是未能成功。8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活到了战后。

奥托后来回忆说，4天后，他们被送到了犹太人的转送站——荷兰北方的韦斯特伯克集中营。1944年9月3日，他们全被押上了列车，这也是最后一列从荷兰开出的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安妮一家所在的车厢里共有70多个犹太人，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天就有一大半人被逼迫着走进了毒气室，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全部被害。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才侥幸躲过了这第一场灾难。

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又一道被送到了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那个集中营中当时有39000多名犹太妇女。她们到那里的当天就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

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她们的母亲强行分开，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

那是1944年10月30日的夜晚，每晚例行的点名刚刚结束，党卫军的守卫把所有的囚犯赶到了院子里，逼着她们一个个脱下了全身的衣服。安妮与姐姐和母亲与数千名犹太囚犯，站立着度过了一整天。这也是她们三人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德国人只给了她们很少一点面包充饥，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们赶进了一个大棚。

少数几个幸存者后来才知道，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到距奥斯威辛大约100来公里的地方，德军正准备逃走。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打算放过这些犹太人。身体好一些的将会被押送到德国境内的波根-贝尔森